三　代　文　明　研　究

李学勤　著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代文明研究/李学勤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8534－2

Ⅰ．①三… Ⅱ．①李… Ⅲ．①文化史-中国-三代时期-文集 Ⅳ．①K22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332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三代文明研究

李学勤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534－2

2011年7月第1版 开本 × 1/16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上编　论文、演讲

一、古史研究

具茨山岩画发现的意义与启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到这里向大家学习、请教。正如大家知道的，我们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现在是第三届了，过去的两届已经博得了盛大的荣誉，已经成为海内外大众共仰的盛大典礼。我相信，我们第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这个全新的面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具茨山岩画。这个发现意义非常重大，我个人对这方面体验不深，特别是我自己还没有机会到具茨山考察，但我希望很快就能亲临实地。根据我个人的所知所能，想对这次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两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向各位请教。不对的或者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具茨山岩画的确认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因为它对下面三个问题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第一个问题是此次发现关系到中国远古文明的萌芽、起源的探索，将给我们带来新的触发。我们的文明是怎么从远古的原始状态进入了文明状态，这个发现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是此次发现为处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里特殊地位的中原地区带来了新的认识。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个地区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方面起着怎样的作用？居于怎样的位置？在这个问题上将给我们带来新的线索。

第三个问题是对位居中原地区中心的新郑这个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也带来了全新的看法。我们过去想象不到的这样一个发现，对于新郑这个地区在整

个中原地区里面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和线索。

岩画在考古发现里面属于过去没有得到充分注意的门类。岩画在中国分布非常普遍，数量相当繁多，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尽管在古书里面很早就有了记载，而且岩画本身在研究古物的文献著作里来说是相当早的。在好多年前，我读到清朝著名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这本书主要是讲青铜器铭文，但里面有一个内容叫红崖石刻，红崖石刻就是岩画，它现在还存在，在贵州省的安顺县。当时中国的学者虽然看到了令人惊奇的岩画，可是并不能认识岩画的性质，认为这是商王武丁伐鬼方的记功碑。它不但是史前时期的岩画，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岩画，可是没有得到大家充分的注意。因此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中国的岩画不受重视，甚至在世界上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岩画。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岩画研究委员会中有一位专家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全世界岩画的分布。他还画了一张图——什么地方发现岩画，就在世界地图上加一个点。其中在亚洲部分，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周围都有很多的岩画，北面的前苏联、蒙古等地，南面的印度、巴基斯坦等环绕中国的地方，点非常密集，可中国在这张地图上是空白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不满，岩画专家陈兆复先生当时给这个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我们中国不但有岩画，并且已经发现了数百处岩画遗址。这封信得到了国际学者的重视，后来陈兆复先生同他们合作，不但观察了世界各地的岩画遗迹，也陪同外国的专家到中国来考察中国的岩画遗迹。陈先生在岩画研究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写的几本书，在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出版，有《中国岩画发现史》、《外国岩画发现史》等。在《中国岩画发现史》中有联合国岩画著名专家写的序，里面还特意提到过去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岩画，直至陈兆复提出抗议后，才知道中国确实有非常丰富而且非常重要的岩画。

我们看陈兆复先生写的《中国岩画发现史》的目录，能发现当时陈先生把中国的岩画分成了六个地区：第一是东北、内蒙古地区；第二是宁夏、甘肃、青海地区；第三是新疆地区；第四是西藏地区；第五是西南地区；第六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其中就是没有中原，特别是河南。这说明考古工作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认为中原没有岩画，岩画都是在周围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后来我通

过一些报道，到个别地区亲自看过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在中原最核心的地区——新郑具茨山地区，有如此密集、古老、内容丰富的岩画，完全出乎想象。

中国过去发现的上千处岩画，都不好和具茨山岩画的发现相比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在中原最核心地区发现了这样的岩画。不是说“过去我们发现1000种，这不过是第1001种”，这个地区像这样密集的岩画过去没有过，因此这个发现是重大的发现。

考古学上的一项发现，能改变我们对一段历史，或者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重大发现。具茨山岩画的发现确实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且今后的研究还会继续改变这种认识。

具茨山岩画不仅在具茨山范围内，而且延伸到新郑以外，整个相连的群山之中都有这样丰富的岩画，证明了我们过去太低估我们的祖先、先人的智慧和能力了。过去我们总以为几千年以前，甚至上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跟猴子差不多，茹毛饮血，浑浑噩噩。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人类的文明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的，我们不能低估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能力。具茨山岩画应该在距今三千年到八千年之间，那时人类已经开始脱离自然界和动物界，逐渐地走向文明，即使那时文明的萌芽离真正文明的门槛还很远，可是这个进步已经开始、已经起步。这是人类的进化，是人类逐步摆脱自然界、动物那种状态，而且与之相对立，利用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种岩画就有它的特别意义。

岩画不只中国有，它是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智慧、能力包括艺术本能的具体表现，这是自然界的动物所没有的。动物没有智慧，不能够反省，不能够做艺术创造。人类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出这种岩画。从全世界的考古发现来说，可以上溯到上万年以前。在美术史上能看到在法国、西班牙一些洞穴里画面的牦牛、用箭射很大的动物等等岩画。洞穴是黑暗的，在没有光的情况之下，用矿物画成今天看起来很有美术价值的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造，我们中国将来也可能发现。就拿具茨山来说，做成的点阵、做成的棋盘格那样规矩，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下围棋、下象棋用的？利用当时的木器、石器是怎么做的？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了不起的智慧。我常常

说，不能够低估我们的先人，而且从我们今天个体的能力来说可能还不如先人。

岩画跟文明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大有关系。为什么大有关系？我们说什么是文明？怎么样才叫做文明？我想大家都知道，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虽然都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可是实际上它是翻译的名词。这两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完全不一样。人类只要能够有所作为，能够使用工具，有一些人造东西的时候，就有文化。比方北京人、元谋人他们都会制造一些工具，甚至北京人还能用火，这是文化，但不是文明。

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应该是文字。要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不是信息科学而是认知科学，是研究我们自己的脑和对世界认知的科学。这门科学在世界发展非常迅速，近 20 年来已经有席卷全球之势。从认知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文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发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文字，我们任何的思想、创造，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根本不可能积累和传播，很快就会失传，没有任何的文明存在。所以文字是文明最根本的一个基础。岩画在一定意义上跟文字的起源有关，现在全世界都认识到，文字的起源一定是从非文字领域出来的；而非文字总是从一些陶器、石器以及像岩画这样的符号领域演化来的。古埃及文字的前身，不是在埃及三角洲地区，而是在埃及三角洲往南，在阿斯旺水坝以南。要向大家说明，很古的人类有意刻画的、可能与文字有关的符号，在全世界并不多，只在几个地点有，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裴李岗文化。大家知道裴李岗就在新郑，有人建议要建立一个裴李岗的博物馆，我举双手赞成。因为裴李岗文化，不仅是我们农业的起源，还给我们提供了符号——在舞阳贾湖龟甲和石器上的符号。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它出现在公元前 6000 多年，迄今已经 8000 年以上了，是全世界能够看到的刻画符号里面最早的，能够和它相比的只有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掘的陶筹符号。我们特别提出，这些石器和龟甲上的符号，它的形状在某些点上非常类似我们的具茨山岩画。比如就像我们写“日”字一样，他就是画了一个方格，这种符号我们在具茨山就遇到过。它的特点是不那么的象形。现在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文字一定是从象形而来，这个观点非常普遍。但是，这个观点在国内或者国际上逐渐地被弱化或者被否定，因为考古学证明不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记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最早是在西安半坡发现很多仰韶文化的陶器，那上面有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就是一些线条。当时出版的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就说这个有可能和文字有关。后来真正认为这是文字的有两位先生：1969 年在新加坡、后来在台湾的学者李孝定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写了一篇论文，明确地说仰韶这个是文字。另一位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发表在 1972 年，题为《中国古文字辩证的发展》，特别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起源于象形，而是起源于指事，就是刻画的线条状的。后来有人反对，说中国也有象形的，像香港的杨建芳先生这样的学者，说中国也有指事，也有象形。但是指出文字不是单纯地从图画起源，这完全符合近年国际上对于文字起源的理解。大家知道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外国的学说，中国古人并不这样说。《说文解字》里讲伏羲画卦，就不是从图画开始的。从图画开始这种理论是由欧洲兴起，特别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戈尔博，他写了一本书《什么叫文字》或者《文字概论》，非常流行，它代表了图画起源说。

图画起源说在近年，已经有美国专门研究文字的女学者白斯拉托著书否定。她做了 20 年的研究，专门研究楔形文字的起源，而且她完全是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证明文字不是从图画起源，最早的是从一些线条形的东西起源。其实白斯拉托的这本书是 1992 年出版的，远远晚于李孝定和郭沫若。当然这都是文字学、考古学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不一定都正确。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具茨山的岩画，以及在裴李岗文化里面看到的公元前 6000 多年的刻画符号，这个和我们中国文明的起源有重大关系。所以我们就想到，具茨山岩画的时代跨度是这么长，它不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造成的。几千处，每一个都那么难做，怎么可能呢？我们尊敬的周昆叔先生，通过他的研究论证了被黄土层掩盖、叠压的岩画，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一定会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岩画即使不是直接演变成为文字，至少也是和文字一样，是我们的先人智慧能力的具体表现。

（原载《华夏源》2009 年第 2 期；又《岩画与史前文明》，九州出版社，2010 年。收入本书时作了删改）

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

“出土文献”这个词，最近十几年在学术界逐渐通行，其特点是与“传世文献”相对举。“传世文献”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而“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出土文献”如就广义来讲，时代跨度可以很长，甚至下及明清，但习惯上多偏重秦以前（或稍延到汉初）以古文字书写的材料，本文所论即采用这种狭义的解释。

中国学者历来对出土文献非常重视，但能对有关研究做出理论性探讨的，应首推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王国维1925年秋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他所谓“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固然可包括各种考古文物，然而从他讲课中说“地下之新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看，实际就是出土文献。通过以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乃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

当然，在王国维的时代，出土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还有限，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田野工作可以说尚未开始。这种工作能够大规模铺开，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来，出土文献大量发现，其繁多丰富，远出前人所能预想，这也就使遵循“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古史，不是漫无边际地从中国这块大地上人类的出现讲起，而主要是指中国文明由萌芽形成到其早期发展的历史。传统上一般认为中

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以司马迁《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炎帝、黄帝的记载为依据的。现在看来，自炎黄以下，不妨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炎黄到尧舜，即所谓“五帝时代”。大家公认，这属于传说时期，然而如王国维所言，“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②]

第二个段落是夏朝到西周，这属于近年学者讲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其间又可以商代盘庚迁殷划一界线，其后由于有甲骨文、金文，我们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机会更多。

最后的段落是东周到秦的统一，由于存在大量传世文献，已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时期，但出土文献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下面，我们就试举一些例子，说明出土文献对于研究上述三大段落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起怎样的作用。

1973 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黄帝书》，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黄老之学的经典性文献。篇中说：“昔者黄宗（即黄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③]这是说黄帝时始称王，同时设立诸侯，与《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记载相合，都表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是文明的初现，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是适当的。

炎黄的传说也见于传世文献《逸周书》的《尝麦篇》，近期的研究证明该篇文句多近于西周较早的金文[④]。篇中记有炎帝、黄帝以及蚩尤的事迹，可见这些传说的古远。其以黄帝刑杀蚩尤论证法律的起源，也可见当时人认为黄帝时已有国家制度。

相对于黄帝来说，有关尧舜的文献神话色彩要淡薄很多。上海博物馆 1994 年入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和《子羔》两篇，都强调舜出身民间，没有什么感应神迹；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穷达以时》，2008 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对舜的描述也是如此。《古史新证》批评疑古派学者，主张尧舜是实有人物，可能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郭沫若论述夏禹，只能引用春秋时的秦公簋和齐侯镈、钟。2002 年出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紾（遂）公唴，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件唴有 98 字的铭文，开头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惊人地相合，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出土材料中的最早例证[5]。

在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真实可信之后，许多人都期待同书《夏本纪》的夏王世系也能以类似方法证实。殷墟甲骨乃是商王室遗物，占卜的是当时大事，自然很难涉及被商朝取代的夏朝人物。实际上夏朝的史影，在甲骨文中还是存在的。

例如在甲骨文祭祀卜辞里，祖先总是或以上甲为首，或以大乙（汤）为首，同时伊尹的地位也极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大乙是代夏的第一位先王。如果没有夏朝和伐桀之事，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至于上甲以及上甲的父亲王亥，为汤的六世、七世祖先，实际就是生活在夏朝的人物。

上面已经说过，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反映商朝后期，即迁殷以后的历史文化面貌，而且多数卜辞是以商王为主体的。近年研究指出，殷墟甲骨里也有若干不是以商王为主体的所谓非王卜辞，以 1991 年花园庄东地 H3 所出内容最为丰富，拓宽了对当时历史状况探索的眼界。

殷墟甲骨分期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已发现的约 13 万片有字甲骨，几乎没有可以确定是早于商王武丁的，并且属于武丁早年的卜辞带有种种粗糙原始的特点。因此，想在更早的商朝遗址中发现内容丰富的甲骨文，恐怕是不大可能的。1953 年在郑州二里岗找到的一片早于殷墟的刻字肋骨[6]，字数寥寥，也表明这一点。

商朝末年开始有文字较多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但字数最多的，如日本白鹤美术馆所藏啑啢，也不过 49 个字。然而周朝一开始，金文便呈现显著加长的趋势，例如 1963 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铭文即有 122 个字。尽管近年发现了若干珍贵的西周甲骨文，对研究西周所起作用最大的，还是金文。

1995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推断西

周共和以上年代，制定了“西周金文历谱”。这份历谱的特点，是强调以青铜器的考古学类型学研究作其基础。通过历谱，可以把大量金文材料排比系联起来，结果发现，西周历史上有四个时期，能够确定的金文较多：

第一个是周朝初年，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周公摄政的时期。这段时间的金文，许多可与传世文献联系对照，如《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有记伐纣子武庚的大保簋；“二年克殷”，有记周公夷平殷都的何簋；“三年践奄”，有记伐盖（奄）的禽簋和冈刦尊、卣；“四年建侯卫”，有记封卫国的　簋；“五年营成周”，有上文提到的记建成周的何尊，等等，不能缕述。

第二个是周昭王晚年。古本《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记载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汉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与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觶，以及近年出现的静方鼎、　甗，等等，很多青铜器，足以证实这一段令人惊异的历史。

第三个是西周中期的周恭王之世。能够排在恭王时的青铜器特别多，人物互相系联，历日彼此调谐，是其他时期少有的。

最后是西周晚期的周厉王、宣王时期。这个时期有关的传世文献较多，特别是《诗》，有不少重要诗篇，可与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等金文一一对照。总的说来，厉王史事更多依靠金文，宣王史事则更便于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

商朝后期到西周，甲骨文、金文这些出土文献，与传世书籍结合考察的结果，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已经处于早期文明的发达阶段，过去有些学者对之估计过低，是不够准确的。等到进入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文明的发展于是走向高峰。春秋时的出土文献，仍以各国金文为主，战国时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则是竹简和帛书。

竹简（在没有竹子的地方是木简）和帛书是我国纸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以前的书写载体。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朝已经大量使用简了。至于丝织品的帛书，最早使用的证据是在春秋晚期。

战国简帛大致可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而书籍对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这种战国时期原本书籍最早为现代学者所见，是 1942 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但由于那时楚文字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内容很长时间未能

得到解读。50年代以后，陆续有楚国竹简出土，同时楚文字释读的水平也逐步提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发现的竹简和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竹简，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有关研究已经使孔孟之间或老庄之间的学术史得到改写，其影响至为深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经校友捐赠入藏一批战国竹简，计2388枚，内容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经过初步观察，发现有多篇《尚书》，有的见于传世本而文句颇多不同，有的曾为传世文献引用但久已佚失，还有些是秦汉以来从未有人知道的。又发现有一种编年体史书，很有些像《纪年》，所记史事自周初直至战国早期，对传世文献有很重大的修正和补充。此外的珍异内涵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⑦。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⑧，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注释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同①，第1页。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第45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④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第87—9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⑤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126—1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⑦ 李学勤、刘国忠：《清华简：先秦历史悬疑有待揭开》，《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⑧《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65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原载《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又《光明日报》2009年11月5日；《大禹文化》2010年第1期）

在“合符文化与龙图腾的形成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我非常荣幸的有机会在今天的这个论坛进行第一个学术性的发言，向大家请教。不过刚才听几位领导、专家的致辞，我觉得有关的学术讨论已经开始了，大家关于三祖文化，关于合符文化，关于任昌华先生在这方面的功绩，以及今天召开的这个文化论坛的意义，都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讨论。

我在下面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三祖文化、合符文化这样一个观念，在学术方面上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当前社会、大众会起怎样的重要作用。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有一个新的变革和趋势，这个变革是什么呢？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而我们五千年的辉煌灿烂文明是由多民族、多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点听起来是平淡无奇的，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在历史学、考古学及有关学科方面实际上起了很大的变革作用。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很长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有关的学科里面，比较占一个主导地位的一种观念、一种趋势，就是它是单线发展的，我们中国有非常辉煌的五千年文化，它是单源、单线，它的起源是一个，它的发展基本上是一条途径的，这样形成的对于整个文化起源、发展的看法，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中原中心论，换句话是黄河中心论，黄河还不是整个黄河，确切的说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中心论这种观点也不是从近现代开始的，中国自古以来很长时间就有。大家知道儒家的经典是在孔子和他弟子的那个时期形成的，他们是在中原地区的，由于那个时期的国家具体形势，他们主张所谓内华夏而外夷狄，特别强调了华夏与夷狄的差别，不是看作一个共同和谐的局面，这就造成了经史书关于不同民族的记载相当薄弱。把中国这么广大的地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

悠久的历史，看成是单源、单线的观点，在相当的时期占着统治地位。当然有些人反对，可是主流如此。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考古学界，全国各地的田野工作普遍开展，就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源、单线，而是多源、多线的。很多过去被认为在文明上不开化的地方，实际上有着非常悠久、长远的文明，这些文明后来是对于被认为是中原的，而且是中心的文化，起着很重要的影响。这个新观点，从考古学开始，到后来古代历史研究，起了重大的作用。

这个和三祖文化的观念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三祖文化和我们经常说的“炎黄子孙”的观念不太一样，但其实是讲的一个事。炎黄子孙、炎黄文化、五千年文明都是从《史记》上来的。为什么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为什么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其根据就是《史记》。《史记》一开头就是《五帝本纪》，它讲了黄帝等等事迹，推算大约距今就是四千七百年到五千年之间，所以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也是这么来的。实际上，今天我们再读《五帝本纪》，蚩尤也在里面，这个传说过去没有很好理解，提出三祖文化，是要强调一个多民族和谐、融合的观点，这个观点是符合文化发展趋势的，也有着比较明显的、良好的现实意义。

我所说的第二点：三祖文化这个词，以及有关的学术探讨，已经有若干年来在涿鹿进行。我认为涿鹿在这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涿鹿来起这个作用，不是哪位先生临时想到的问题，“千古文明开涿鹿”这句话，其实是有着很深刻的根源的。

涿鹿这个地方，这个名字怎么讲，为什么叫“涿鹿”？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特点，一看就知道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现在我们能查的文献当中，这个词最早出现不是《五帝本纪》，因为司马迁是汉朝人，这是比较晚的。以我个人所知，“涿鹿”这个词最早见于《逸周书》中的《尝麦篇》，《逸周书》这部书基本上是从先秦传下来的，一直有人认为它出现比较迟，但它的很多内容是比较古老的。尝麦，这是古代帝王每年都要进行的一种仪式。在春天开始的时候，要尝麦，这是当时的一种礼仪。《尝麦篇》里面引用了很多的史事，里面有很大一段讲了三祖的故事，这要比《史记》里面的记载古老。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意见还值得考

虑，我可以告诉大家，虽然《尝麦篇》的内容经过后人修订，里面有后人修订的痕迹，但它一定作于西周，因为它的文句特点是西周的。这里面已经讲了黄帝、炎帝、蚩尤的故事，而且特别提到了涿鹿。

其实有关的故事在《尚书》里面就有，其中很重要的一篇就是周穆王时的《吕刑》，它里面就讲到蚩尤的事情，蚩尤杀戮无辜，但没有讲到炎帝和黄帝的名字。可是《尝麦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上古“诞作二后（后当时指帝王，这两个帝就是炎帝和黄帝）……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黄帝杀蚩尤于中冀，也是涿鹿，至今河北还叫冀。九州的中心在冀州，涿鹿在冀州之中。蚩尤被杀于涿鹿这个地方，所以叫绝辔之野，辔就是马的缰绳，把马的缰绳都打断了，战争还是很激烈，这当然带有明显的神话传说性质。这就是我个人所能贡献给大家的古书关于涿鹿的最早记载。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文献上的古史传说。今天大家在涿鹿这个地方祭祀三祖，根据就是古史传说。我们怎么看待古史传说，这个问题在社会公众面前提出，在学术界也有多年的讨论。这些年来在中国先秦史学会上，我曾经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古史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是不同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历史要是没有古史传说，那就缺一大块，所以说它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它又是跟后面的历史不一样的一部分，不能拿对后代历史的要求和研究方法去要求和研究古史传说。比如说秦汉的历史比较清楚，因为我们有《史记》、《汉书》，尽管里面也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可信，可是它没有怀疑，没有人说汉朝不存在，或说秦朝不存在，甚至说没有秦始皇这么个人，没有人会这么说的。我认为这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有《左传》、《战国策》、《史记》当中的各种记载。过去有人怀疑《左传》是后来人编的，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怀疑了。所以说春秋战国以下中国是历史时期，也有可以怀疑可以考证的，可是历史就是历史，有它的一套研究方法和一定的根据，我们不能否定。再往前就不是这样，西周、商代、夏代的历史，有没有历史记载，当然有了，但它的历史记载不充足，我们知道的不多，而且越往前知道得越少。所以说这段时期考古的材料、古文字的材料和古书的材料同等重要。至于再早的五帝时代，各种记载相互矛盾，会有不同说法，就需要用考古学、人类学的方法